

对父母的惩罚

(苏) 阿·里哈诺夫 著
邹烈贞 译



DU
FU MU
DE
CHENG FA

对父母的惩罚

〔苏联〕阿·里哈诺夫 著

邹烈贞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年 北京

责任编辑：李紫林
封面设计：李刚

对父母的惩罚
〔苏联〕阿·里哈诺夫 著
邹烈贞 译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137千字 6.5印张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7-80035-185-8/G · 58
定价：3.15 元

前　　言

阿里别尔特·里哈诺夫，生于1935年，苏联当代著名作家，《接班人》杂志主编。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奖。苏联社会学者曾经在广大青少年读者中举行过“你最喜欢哪一位作家”的民意测验，结果，里哈诺夫为得票最多的五位作家之一。

里哈诺夫的作品，大多以青少年生活为题材，敏锐地反映当代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他不回避生活的复杂性和阴暗面，并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热情歌颂善良、正义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鞭挞只顾一己私利的卑劣行径。他的作品一般都涉及全社会关心的迫切问题，因而常常引起强烈的反响。

本书收了他的两个中篇。《对父母的惩罚》反映的是婚姻家庭这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小说以祖母索菲亚·谢尔盖耶芙娜作为第一人称，回叙了“我”为养育非亲生儿子而辛劳的一生，以及生性懦弱的儿子的恋爱、结婚、得子和后来的被遗弃。小说主要是回叙“我”的孙子的短暂的一生。孙子伊戈尔，物质生活非常优裕。父母的离异使他感情贫乏，精神空虚。因为缺乏父母的爱抚和家庭的温暖，他失去了对生活的乐趣和前进的力量，终于自杀了。这出悲剧是一个十六岁的当代少年对只顾自己而遗弃子女的父母的最严厉的惩罚。作品写了三代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对比鲜明。作者称，他“写这部作品，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孩子，也是为了维护我们的未来”。该作品发表后，苏联文学界给予很高的评价。

第二个中篇小说《怪老头儿》，写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后方生活。通过一个少年的叙述，作者生动描绘了少年与马的深厚感情，同时塑造了马车夫米隆的生动形象。米隆是个被扫地出门的富农分子，他郁闷、怪僻，对人冷酷无情，甚至对小孩子，对马也都十分凶暴。后来竟然激怒了一向温驯的马，最终被马踢伤致死。作者在小说末尾大声疾呼：“不同的时代都有各自的残暴，而善良，唯有善良才是永存的。”这或许就是里哈诺夫这部作品的主旨所在吧！

目 录

对父母的惩罚	(1)
怪老头儿	(136)

对父母的惩罚

—

我犹如在一个无底深渊里拼命挣扎。绝望中，用瘫软的双手使尽最后一点力气，划开浑浊的泥水浮出了水面，好像是从虚无缥缈的另一个世界逐渐苏醒过来。忽然传来了忘却已久的、低沉的鸟语声。

一片寂静。车窗外朦朦胧胧，夏日的夜色笼罩着大地。列车停住了。我吃力地站起来打开车窗，仿佛还在无底深渊里挣扎。

从树林里飘来一股新鲜气流，驱散了包厢里的闷热空气。就在这同一瞬间，从路基旁的灌木丛中传来了夜莺的歌声：先是一声高亢悦耳的鸣叫，接着是婉转的啼啭和一些说不清是什么的声响，真像一个玄妙的音箱在自动播放优美的乐曲。在我近旁，第二只夜莺应声而起，紧跟着又是一只夜莺的啼啭。铁路旁黄昏时刻的鸟语声，使我感到无限的惬意。

但这只是一瞬间。

起初一刹那，是激动人心的快乐，接着就是使人忧心的战栗，很快又变成了一阵痛楚。它之所以使我感到瞬间的快乐，只是因为我服用了两片苯海拉明之后还没有从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虽然我摆脱了那种似乎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幻觉，但还没有完全清醒。夜莺的歌声使我回到了现实中来。

然而近旁鸟儿的啼鸣和不能获得的幸福又立刻使我的思路回到了昨天、前天，回到了突然传来噩耗的电话铃声的那一天。

我不由得感到一阵窒息，热泪盈眶。车窗外朦胧的夏夜景色变成了一片模糊，只有夜莺的歌声还是那么悦耳、清晰。为了忘却自己遭受到的不幸，我真想变成聋子、瞎子，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听到周围的一切。但办不到啊！夜莺的歌声，这大自然中可以慰藉心灵的动听音乐，依然飘入我的耳朵。这和我遭受到的不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内心的苦楚也就变得更加强烈。

列车徐徐启动了，夜莺那充满幸福的歌声并没有停息。当列车已经全速奔驰，车厢里还不时听见声声啼鸣。

为了摆脱内心的痛苦，我又吞下几片安眠药。

安眠药会使人昏昏欲睡，但却不能让你立即进入梦乡。

现实与幻觉不断地交织在一起。每当车站上那刺眼的灯光射进昏暗的包厢时，又不禁使我阵阵战栗。

在这难以忍受的昏暗日子里，我幸好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坐火车回去，而且买下了两个铺位的车厢包房车票。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小房间里。审判案件的预审室也许就是这样的吧？为什么是预审呢？这是终审，是我自己在审判自己，因为那是我的孙子和我的儿子啊。现在我是在回家的路上，回到女儿身边去。在到家之前，我必须好好地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天哪，我为什么会受到这样残酷无情的惩罚？

我闭上了眼睛。安眠药产生了效力——它使我的心情平

静了许多。昨天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火车缓缓移动，萨沙和伊丽娜一前一后地跟着我的车厢，我站在列车员——一个身材纤弱的年轻姑娘身后，也就是站在她抓住车门扶手的胳膊后边，疲惫不堪地倚靠着车门旁边的板壁。列车员用她那纤细的胳膊挡住我，担心我会跌到月台上，跌到萨沙和伊丽娜身边去。

他们跟着车厢越走越快。萨沙默不作声，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伊丽娜终于撕掉了假面具，显出一副无所寄托无所依靠的可怜相。这时候我怜悯她了，我们的处境谁也不比谁好些。首先需要的是克制。克制自己？这怎么办得到呢！

“妈妈！”萨沙嘶哑地喊道，他那憔悴而哀伤的面孔不停地抽搐，“妈妈！”

他再也说不出什么别的话来。伊丽娜倒像是在接着他的呼唤：

“现在该怎么活下去呀？”

怎么活下去？我沉默不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生活，该怎么呼吸，该怎么面对这纷纭繁复的人世。

你们该怎么活下去，我同样不知道。

我只是默默地摇头。

我亲爱的，你们不是一直在不惜代价地为这个而奋斗吗，现在你们总算尝到苦果了！在小伊戈尔住过的房间里，我把所有的话都说尽了，我的这些话仍然留在那空荡荡的单间套房里，现在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微微闭上眼睛。当我睁开眼时，正好碰上年轻的女列车员那惶恐不安的目光。她茫然不知所措。两个眼泪汪汪的成年人跟着车厢走，车上还有一个失声痛哭的老太太站在她

身后，被她那纤细的、似乎不那么靠得住的胳膊挡着。她也许是怕我从车上掉下去。说真的，我的两条腿几乎快支撑不住了。

我连挥手告别的力气也没有了。我点点头，别了。现在你们两个又站到了一起，虽然仅仅是在这个月台上。

你们互相间是不是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

我常常做美梦，最近几年它反复出现。起初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梦是一种预兆，具有象征意义。

梦中，我又成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穿一件白色连衣裙，赤着脚，朝我家别墅前面围墙边的邮箱跑去。信箱是木制的、做工粗糙，体积很大，整包的印刷品都能塞进去。每次我跑到邮箱前，打开边门朝里瞧的时候，总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彩色明信片、书信、一些通知单之类的邮件。

我怀着满腔喜悦翻遍这些邮件，其中当然有我的信，但都是女朋友、阿姨或者别的什么熟人写给我的。我失望了，因为我盼望的不是这些信件，而是一封很重要的信，至于是谁寄来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该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大人，一个受尽命运折磨、精力衰竭、满头白发的人；也许该是一个异乡的小伙子，我从来没见过他，他却认识我，正要给我写信哩。我这个傻姑娘就是想收到这样的信。我期待着，耐心地期待着。

每当我做这个美梦时，我好像插上了翅膀，整天地飞翔，尽管该收到的信都已收到了，而不再指望再收到我盼望的书信了。但这个美梦似乎使我衰老的躯体又变得年轻、变得有活力，使我从心灰意懒的状态中挣脱出来，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这时，我不知为什么突然笑了起来。大概因为回忆起了往事：我家门前是高高的台阶；笑容满面的爸爸妈妈坐在台阶上是那么平静，松林的茂密树叶在他们头顶上沙沙作响，空气里充满了在阳光烘烤下散发出来的松脂芳香；我沿着用白石块铺成的小路连蹦带跳地跑到围墙边那可爱的大邮箱近旁，打开边门，取出一大叠彩色明信片。

我过去曾有过这种事吗？这个梦是不是我过去经历的再现？我不知道。至今我也不知道。不过总是做这个梦，而且年纪越老越是常常梦见。于是我相信：这件事可能真的发生过。

我最后一次做这个梦是在一年以前，当时我正在莫斯科伊戈尔那里。童年的情景如梦幻般在脑海里出现过三次。我这才领略到这个梦的含意。伊戈尔的命运使我困扰，我试图给他寻找一个坚实的支柱，但没有找到。最后还是下意识帮了我的忙。我从梦中醒来之后才明白伊戈尔需要一个穿白裙衣的赤脚姑娘，他需要一颗期待爱情的赤诚之心，只有这颗心才能使他得救。

得救？这个词竟使我为之一惊。搭救、解脱——我大概是过于急切才想出了这样一些意义近似的词语。这些词语太迷信了。又有谁相信会出事呢！对，对，一颗赤诚的心才能使伊戈尔得救，才能使他得到解脱。可是命运之神并没有赐给伊戈尔一个我梦幻里的那样的小姑娘，这样的好姑娘未曾在他身边出现。

这是一种幻想，是我受尽折磨的心灵臆想出来的，是用来拯救他的-一线希望。所以是不现实的，我的孙子伊戈尔却需要实实在在的的拯救。为什么？

他的爸爸妈妈离婚了。

不过，这是小说后来要讲的事情，开头却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原在一所大学图书馆工作，负责管理阅览室。从莫斯科到我们这座城市，乘火车有两昼夜的路程。我出生在红色普列斯纳区，是个地地道道的莫斯科人。来到这里之后生活也过得很快乐，因为摆脱了首都的烦扰和那些痛苦的往事，像许多人那样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年轻人来说，大学图书馆是心地平静、灵魂纯洁的一片绿洲。在这里，可以随着岁月的流逝成长，即使到晚年，也仍然能保持青春时期的特征——单纯和天真。在这里，不用担心碰到什么麻烦和被人讥笑。因为，第一，经常和年轻人接触，他们还不会装腔作势、口是心非；第二，和他们的关系也很简单，一般只限于借书还书，而且按阅览室的制度，每天只开放几个小时。图书馆领导要求我们像钟表一样准时上下班，别的要求就没有了。其实，工作时间并不算短，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两班倒。阅览室经常座无虚席，读者都是来自各个系、各个年级的学生，所以不可能统一组织什么读者座谈会或别的活动，因为这样反而会干扰他们。再说，他们连准备课堂讨论、应付考试、完成各科作业和准备补考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干别的。总之，这些可怜的大学生成天忙忙碌碌，各人都有一大堆操心事！

每天，我们先把各种图书陆续借出去，下班前再收回来，还要到阅览室附近的教室里去催促学生还书。每个单位都有一定的制度嘛，再说，当时有许多工具书还不够用哩。

我和自己的三个助手相处得比较友好。大家都是以诚相

见。这三位女同志实在是太可爱了。身材修长的丽莎，长着两道哥萨克式的浓眉，后来嫁给了一个匈牙利留学生，现住在布达佩斯，成了三个孩子的胖妈妈，每逢元旦和三八妇女节，她都要给我寄来明信片表示祝贺，有点儿雀斑的安东尼娜·尼古拉耶芙娜，我们都叫她托尼亚，是个乐观健谈的姑娘，后来患了癌症，仅两个月的时间就病逝了；我们当中最年轻的阿加莎还在大学里工作，当了图书馆馆长，每次遇见我都要自我嘲弄似地笑着说：“你瞧，成天埋在书堆里，都被尘土薰干巴了，快要变成干瘪老太婆啦。可是一走出图书馆又仿佛喘不过气来似的，又觉得还是埋在书堆里舒服。”

阿加莎上了年纪才变得这么幽默，她年轻时可不是这样，比谁都喜欢大惊小怪，动不动就把本来就够大的樱桃般圆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眉毛扬得高高的，跑来对我说：

“索菲亚·谢尔盖耶芙娜！那里又有人在接吻啦！”

这有什么法子呢！大学生总归是大学生，他们就是喜欢接吻。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合情理的一条生活规律吧。

我并不反对他们这样做。有时，晚上到各个空教室去走走，说实话，真不好意思去打扰人家的美好意境。不过，书本早就被大学生们扔在了一边，他们还用书包和手提包堆积成一道堤防。这能防谁呀？堤防后面是恋人们的地盘。他们躲在那里不是喃喃咕咕地谈情说爱，就是抱在一起亲吻。

后来，我甚至想出这么个办法：我白天穿平底鞋，这样脚感到舒服一些，晚上要去各个教室催促还书时，就换上高跟鞋，以便让那些恋人们能听见脚步声。这还不算，到了教室门口脚步得加重一些，意思是先打个招呼：“喂，可爱的孩子们，我们要下班了，快把书还回来吧。”

这些事经常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有时候学生都上课去了，我们这几个人就凑在一起议论如何向谈恋爱的大学生预先发出警报才更有效。托尼娅说，她走到教室门口先是用直尺敲门，狠狠地重敲三下，稍停一会儿才敢放心大胆地开门进去。真的，托尼娅每天晚上总是随身带着一根直尺去教室催促学生还书，久而久之，学生就给她取了一个有趣的外号——直尺安东尼娜。

丽莎用的却是另一个办法。她情绪好的时候就用歌声发警报。她在走廊里一边走一边哼流行歌曲，但有时也不起作用。热恋中的大学生们对她的歌声往往反应迟钝，也许她唱的歌不对路。于是丽莎只好站在教室门外学布谷鸟咕咕叫。我再说一遍，丽莎只是在她情绪好的时候才会这样做。一旦她情绪不佳，而且经常都爱要点儿小脾气，那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破门而入，站在门口嚷道：

“还有没有个够？”

或者一句话不说，站在门口用鄙视的目光扫视一对对恋人。唉，丽莎如今在布达佩斯不知过得怎样？

只有阿加莎想不出办法来对付这些大学生。晚上转完教室回来时，她总是把眉毛挑得老高，大惊小怪地嚷道：

“索菲亚·谢尔盖耶芙娜！那些大学生又在接吻啦！”

我叹口气。我们只好耐着性子等待这稀稀拉拉的几对情人。不一会儿，他们就陆续出现了，一个个羞答答地目光朝下，静悄悄地走到我们的借书台前，含糊地说：

“对不起，耽误你们了！”

或者深深地点头，糊里糊涂地打个招呼。夜，已经很深了。

在如何使用三号房间的问题上，我与阿加莎产生了分歧。这是我们的一个争论焦点。

我们借书的地点是在阅览室旁边一个单间里。书架上摆着教科书、工具书等各种最常借的书籍，邻近的两间屋里放的藏书，全部按字母顺序排列得整整齐齐。在最里头的那间屋子，我们放了一张小饭桌，窗台上藏着一个小电炉，上面用空蛋糕盒盖着。小柜里是餐具。我们工作之余就坐在那里喝茶，有时炒鸡蛋吃，或者煮上一锅土豆，或者熬一锅碎麦米粥，这就是我们的午餐。除此之外，那张小饭桌就闲着没用了。在这么宽敞的三间屋里，有时显得比较冷清。因为只有两个人上班（我们四个人两班倒），只有在交接班时四个人才能碰在一起，这时正是中午大学生借书的高峰。他们像刚入学的中小学生似的，一窝蜂拥在我们借书台前，一个个伸出胳膊，摇晃着借书证，又喊又嚷，大嗓门一个压过一个，嘁嘁喳喳真像一大群乌鸦。

我喜欢这喧喧嚷嚷的场面。男学生趁着排队借书的机会眉来眼去地调情，女孩子也忸怩怩地卖弄风骚。平时他们更多的是闲着没事，而在这忙乱时刻却硬要假装正经地大吵大嚷，以显示自己的求知欲是如何强烈。在借书的高峰时刻，我们这些管理员就得高度集中精力，反应要快，十分熟悉放书的位置，随手就能取出读者需要的书；索取图书卡片要手疾眼快，还需要有好的记性，只要见过三四次面就能认识借书的人，根本不用看学生证。

借书高潮之后，慢慢平静了下来，图书馆的工作节奏又恢复正常，不太忙，但也闲不住。我们中间两个人回家休息，两个人留下来值班。这三间大屋子又显得太空旷，太冷清，

太寂寞了。

如何使用三号房间的问题，也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有一次，阅览室坐满了读者，附近教室又都在上课。这时走进来一个学生，他叫奥列格·奥西波夫，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我们这几个人按他姓名的头两个字母背后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噢·噢”）。他借了一本工具书，笑着叹了口气，表现得十分发愁的样子，用低沉的声调对我们说，这里挤得满满的，没有立锥之地，这可怎么办！于是把他带进了三号房间，让他坐在我们的饭桌旁看书。

奥列格·奥西波夫学习用功，还喜欢文学。快下班的时候，我允许他去书架上找书，只是不要搞乱了书籍排列的顺序。第二天，我来接下午班的时候，小伙子又已经坐在三号房间看书了，好像从昨天起就没有挪动过。托尼亞非說是因为我昨天同意“噢·噢”继续坐在这里学习的。奥列格随着也站了起来付之一笑，然后殷勤地帮我脱外套。我当然也就不好意思再让他去大阅览室了。

不久，物理系的学生奥莲卡·奥里吉娜也来了。她是一个浅色头发、灰眼睛的漂亮姑娘。

女人们一般难得欣赏女性的美貌和魅力。这与其说是属于男人独有的特权，还不如说是因为女人的心胸不够开阔。但也不尽然。尤其是当一个女人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青春年华已经逝去的时候，她就能容许自己去尝试一下这种从前绝不容许的享受——赞美其他女人的容貌。我从前有许多过错，唯独伪善虚假这一套我始终没有学到手。所以我能先于别人去赞美女人的魅力并为此感到高兴。对这个物理系的大学生奥莲卡·奥里吉娜更是如此。这位漂亮的姑娘简直是和谐的

化身——匀称的身材，高耸的乳峰，面部表情开朗，流露出自信的神情。她真像一位电影明星，但同时又没有丝毫的谄媚、做作、不检点。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姑娘，就对她有了好感，向她报以微笑，乐意和她交谈。她却十分腼腆，我也不好难为她了。于是我主动让她去三号房间学习，这是我第一次超出我们之间一般关系的举动。奥莲卡脸上泛起了红晕，跟着我走进了三号房间，还被门槛绊了一下。这时，奥列格·奥西波夫已经坐在那里了。

“但愿你们不会互相影响，”我对奥莲卡说。她镇静下来，摇了摇头。

我没有发现奥莲卡·奥里吉娜和奥列格·奥西波夫这两个学生的姓名有什么能够联系起来的地方。男女大学生在一起学习是常有的事，这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那个爱说爱笑的托尼娅却首先注意到了这件事。我刚把奥莲卡送到三号房间，托尼娅就把眼睛向上一翻，哼哼哈哈地嘟哝起来：

“噢——噢，噢——噢！”

“喝水吗？你不舒服啦？”

“我很好，”接着又说，“噢——噢，噢，——噢！”
她这分明是在调皮捣蛋。

我摇了摇头。

“您还不明白？真够可以的！”托尼娅悄声说，“奥莲卡·奥里吉娜，奥列格·奥西波夫，您看四个‘奥’字，都碰在一起了。”

“啊，真的！”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心想我可得注意观察一下，看看这四个“奥”字的两个学生会怎么样。

他们各自坐在桌子的一方，埋头看书，彼此似乎都很腼